



贵州党史资料

第五辑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办公室编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贵 州 党 史 资 料

第 五 辑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办公室编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貴州黨史資料
第五輯

編輯：中共貴州省委黨史辦編輯處

出版發行：中共貴州省委黨史辦

印刷：貴陽大南印刷廠

前 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贵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创建过光辉的业绩，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中国工农红军，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曾五次进入贵州，足迹遍及我省六十多个县市。红军转战苗岭高原，建立根据地、游击队，播下革命的火种，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贵州地下党自一九三四年建立直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贵州解放，领导贵州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贵州的解放。

云南、四川等邻省地下党，派人到贵州边境，与贵州人民一起并肩战斗。

我省无数先烈，为了贵州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用生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贵州解放三十五年来，我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贵州有着丰富的党史资料。

为了发掘、积累和交流党史资料，加速我省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为党史研究、编写提供史料，为党史教学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教材，我们编印了《贵州党史资料》。

《贵州党史资料》从一九八五年起，将陆续分辑编印。刊载的内容为：史料、回忆录、文献（包括文件、布告、电文、信函、日记、诗文、手稿等）、党史人物传记、专题研究（包括史论、辩证、订谬、考据）、专访、座谈纪要等方面的文章。

《贵州党史资料》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史实方面力求准确、真实。但是，有些史料由于时间久远，有较难考证之处，加之，限于作者个人见闻的局限性或记忆有误等原因，某些稿件涉及的内容，也难免有失实之处。还望知情者补充、订正，也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同时，我们希望大家本着对党、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为我们提供尽可能翔实的史料。

编 者

目 录

前 言	(1)
-----------	-------

· 回 忆 录 ·

我在贵州地下党斗争的历程	缪 伦 (1)
关于贵州地下党的情况	徐健生 (17)
回忆我的战斗历程	杨天源 (36)
难忘的峥嵘岁月	李小侠 (61)
回顾紫云地下斗争	王起科 (73)
贵州工作回忆	张光昭 (89)

· 综 述 ·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党的建设	(97)
遵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	遵义地委党史办 (102)
安顺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情况	安顺县委党史办 安顺市委党史办 (116)
浙江大学遵义湄潭时期的学生运动概述	庞曾漱 陈耀寰 吕东明 (128)
湄潭地下党两次被破坏始末	湄潭县委党史办 (156)

顽强战斗 迎接解放

- 赤水地下党斗争简述……………赤水县委党史办(166)
- 凯里党小组的战斗历程……………凯里市委党史办(184)
- 活跃在川滇黔边境六年之久的一支游击队
……………毕节地委党史办(198)
……………毕节县委党史办
- 威宁游击团革命斗争史稿……………威宁县委党史办(215)
- 海田游击大队武装斗争概况……………威宁县委党史办(250)

· 人 物 ·

- 怀念黄大陆同志……………严金萱(259)
- 周素园同志传(初稿)……………贵州省委党史办(269)
- 贵州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战士
——记熊蕴竹同志……………贵州省委党史办(336)
- 深切怀念我的舅父刘方岳……………聂奇慧(349)
- 革命道上的铺路石
——记地下工作者尹素坚同志……………贵州省委党史办(364)
- 悼念希均、汝达两烈士……………陈梧山(377)

· 文 献 ·

- 贵阳市全体学生告各界同胞……………何广键供稿(387)
- 织金地下党保藏文件选刊……………省委组织部供稿(389)
- 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为呼吁读者响应本报总馆号召援助
香港反汪罢工工友募捐启事……………吴之平供稿(405)
- 张凤鸣烈士遗墨……………省委统战部供稿(408)

我在贵州地下党斗争的历程

缪伦（缪正元）

我离开贵州已五十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曾辗转跋涉，走过许多地方，然而对贵州，对毕节，我早年生活、战斗过的这块土地却有着深切的感情。这里，让我谈谈三十年代初、中期的一些革命活动情况，为贵州党史提供一点资料。

一、从毕节、武汉到上海

我小学毕业后，因家境不好，通过父亲的关系进了毕节电报局。在电报局里当见习报务员，这段时间我与小学时的同学李远芳（又名李肃如，化名林青、矛戈、刘运生）接触较多。

肃如的父亲叫李吉安，江西吉安人。据说是挑担子的，来贵州做小生意，落脚在毕节城里（肃如的母亲是毕节人），以后开了一个小客栈——“吉安”客栈，勉强维持生活。肃如有个姨妈嫁在毕节城里的刘万泉家，刘家开了一个百货店。肃如小学没有毕业，就在刘家的百货店当学徒。刘家的百货店和四川的一些商号有往来，肃如常到电报局来打电报。在和肃如的交谈中，我看得出肃如很不满意在刘家过这种学徒生活，以后，肃如离开毕节到了重庆。

电报局整顿时我被淘汰出来，以后，我又到一家火炮铺做

工。做火炮要硝，我同个姓何的师傅常去贵阳买硝。在贵阳听说秦天真在学校里（高中读书）搞了不少的革命活动，当时我还不太理解这些活动的意义。有一次，从贵阳买硝回来，接到大哥缪象初从武汉打来的电报，叫我到汉口去。缪象初同毕节的糜藕池等人曾在云南的地方军阀部队的陈行紫电报队当报务员，后随云南部队到了广州，进了黄埔军校。他早年受毕节开明人士周素园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进黄埔军校不久，就参加了学校里共产党人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糜藕池也进了黄埔军校，他参加了学校国民党右派的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缪象初由周逸群、李侠公介绍入党。1925年至1926年这段时间，大哥和黄埔军校里的贵州籍人，不断寄一些进步书籍回毕节来，许多是有关“五卅”惨案、“沙基”惨案、“香港罢工”的小册子，还有反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宣传品。大哥参加北伐到了武汉，就打电报叫我去。1926年底和我一道离开毕节的有两个同学，吴铁铮和张毅中。吴铁铮到赤水后考入地方军阀办的崇武学校；张毅中去汉口后，到周素园的女婿王崇素家的商号当了学徒。

在汉口我找到了大哥。他当时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政治部当秘书。1927年初我进了汉口湖北省立第二中学，经教务主任、共产党员杨献珍介绍加入了共青团。

“马日事变”后，国共分家，我们的学校停课了。我哥哥就将我安排到王崇素家当学徒（这时，缪象初参加了南昌起义），我在王崇素家认识了他的侄儿王芸生。在王崇素家进进出出的有第十五军的许多贵州人，有共产党员杨显之、饶近庄（饶博生的哥哥）、黄英伦（黄齐生的侄儿）、董恕和车叔云等。王家有这些人常来常往，因而王崇素受到的影响很大，思想比较进步，

倾向革命。我介绍王崇素的弟弟王文楨加入共青团。王芸生年龄小，没加入团的组织，但跟我们做过一些事，如上街撒传单到纱厂、打包厂搞宣传等。

1927年冬，我到上海王崇素的商号——天丰号当学徒。这时饶近庄也到了上海给党中央跑交通（1928年在江西牺牲了）。杨显之也到了上海，据说以后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杭州监狱，他参加监狱暴动被敌人杀害。黄英伦也到了上海。

1928年我考入了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校址在上海郊区的江湾。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李肃如由重庆来上海，找到了我，同我暂时住中学部里，肃如告诉我，他曾参加过1927年3月31日，重庆各界举行的抗议英帝国主义炮击南京市民制造“南京惨案”干涉中国革命的群众集会。这次集会遭到四川军阀的镇压，（即“三·三一”惨案），他还被拘押了几个钟头。他是在西南美专入的团，当时我俩都失去了与团组织的联系。我们在江湾的这段时间，有几个贵州人来考过我们的学校，其中有严金操（即袁超俊，后为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负责人）和钟大亨。他们没有考上，生活无着落，我们设法从学校的食堂里搞了一些米来救济他们。后来，严金操和钟大亨进了杭州公路局，学开汽车。以后由于局势紧张，学校解散，每人发了二十元钱。我与几个同学曾去过无锡编音乐书籍，搞罐头公司，解决生活问题。这时，李肃如由度予之介绍接上了团的关系，在沪东团区委工作。肃如接上团的组织关系后，也把我的关系接上了，经组织安排我到沪西的小沙渡的街道支部后我任区委发行部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我和几个贵州籍的青年在沪西租了一间房子，以黄英伦为头，搞了点钱，成立了一个抗日救国丛书社，

叫觉人书店。当时在书店里的有金啸远、郑远嵩、陈卷西等。这一段时间我又结识了几个贵州人，有谢铭荣（即谢凡生）、乐石碌等。我介绍金啸远、郑远嵩、谢铭荣、陈卷西加入了“社会科学研究会”。会址在沪西，是曹狄秋负责。

我在发行部给肃如提供过一些书，有《中国青年》、《布尔什维克》等。由于有人告密，李肃如被英租界的巡捕捉了起来。巡捕在他的住处只搜出一本《布尔什维克》，把他关在西牢，判刑两年，和肃如同牢的有个叫吴亮平的，吴是经济学家，共产党员。在吴的帮助下，肃如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他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很快。肃如被捕后，沪西区委和沪东区委通过互济会的关系曾请律师去营救过他，但西牢不放人。

我们的觉人书店成了沪西区团区委的接头点，团区委书记叫老朱。在觉人书店我们每人值一天班，我兼搞推销，到各校推销书籍。

“一·二八”以后，我们的活动更多了。沪西工厂大罢工，为了支持大罢工，中央苏区汇了一万元钱接济工人，但不能向工人说明，故我们以贵州学会的名义捐赠一部份，将这笔款转交给罢工工人。我们也在社会上为工人募捐了一部分钱支持工人罢工。我和谢铭荣、乐石碌等将一些进步书籍，如《中国青年》寄回贵州。

“觉人”书店的活动引起敌人的注意，巡捕来抓人，抓走了金啸远、郑远嵩、陈卷西，谢铭荣等人，都关在西牢。我因乐石碌及时通知，才未被捕。“觉人书店”被破坏后，特务到处追捕我，我四处躲藏，前后搬了四次家。1932年4月底，我也被捕了，关在上海曹河泾龙华监狱，后又转到苏州反省院。

金啸远在牢中经曹狄秋介绍入了党。金啸远入党后又介绍谢铭荣入党。后来金啸远在狱中牺牲。

1933年底，英王举行登基二十五周年大典，实行“大赦”，李肃如提前半年释放出狱了。我坐了一年多的牢也出来了。肃如出狱后，通过杨显之的妹妹杨玉珍的关系，了解到我的住处，我们会见了。从杨玉珍那里才知道谢铭荣在狱中惨遭毒打，双腿被打坏，为了保住生命，医生只得把他的一条腿锯了，后来谢铭荣的妹妹谢光琪来接他回贵州。上海的白色恐怖严重，我们找不到组织，加之生活困难，吃饭成问题，我和肃如商量，回贵州建立苏维埃，继续搞革命活动。

二、草原艺术研究社与毕节党支部

我们离开了上海，经汉口到重庆，在重庆等船的时候，肃如还到原西南美专老同学处去联系过。我们从合江到赤水，回到贵州，在回毕节的途中，我们在金银山住了一宿，住在一个远房亲戚家，肃如趁这个机会了解金银山一带的情况，农民拥有武装的不少，肃如这时就已立意建立革命武装了。

我们回毕节时，秦天真带了几个人在城外马路上接到了我们。当时毕节的李仲文、宁启楠等几个青年，向我们反映，想到上海去见见世面。肃如鼓励他们出去，还给他们写信到上海找熟人，找落脚点。

我们回到了家乡毕节，肃如的家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那么穷，还是靠“吉安”小客栈维持生计。我父亲仍然在电报局工作，当时呆在家里的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叫缪庆元，妹妹叫缪淑馨（宋达谦同志的爱人）。

毕节县城有个传统习俗，群众在新年都喜欢看戏、演戏，热闹几天。我们要借这个机会宣传外面的东西，宣传进步思想。但搞文艺活动，宣传进步思想，应该有个组织形式才行。我们一商量，决定组织一个文艺社团，经过反复考虑取名叫“草原艺术研究社”。我们在秦天真家后面的庙里开过筹备会，又在周慕桥家、李少文家开过筹备会，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我们借用女子小学作社址，“草原艺术研究社”就明锣正鼓地成立了。草原艺术研究社”的主要成份是青年学生，主要领导者有三个：李肃如、秦天真和我。

为了更好地指导“草原艺术研究社”的活动，扩大影响，宣传革命，培养干部，为尔后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武装根据地做准备，建立党的组织的问题就自然地提出来了。

在“草原艺术研究社”的青年中，只有我和李肃如是团员，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在革命斗争的特殊历史阶段，地下斗争的非常时期，一般青年团员年满二十三岁后即可转党。那时，我和肃如均年满二十三岁，所以由团员转为党员。但建立一个党的支部，至少要三个人，而我们只有两个人，支部的人选我们当然地想到了秦天真，他在贵阳的活动以及家庭情况我们都很了解，比较满意。建立支部的事我和肃如大约酝酿了两个星期。我们正式向天真谈了这件事，天真很高兴。我和肃如遂介绍秦天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为监誓人，肃如原则性很强，虽我俩已转党，但仍一道进行了入党宣誓。入党宣誓是在毕节城后山的一个小坡上进行的，我记得那天下大雪，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入党宣誓由肃如主持，我们宣誓入了党。贵州地下党毕节支部由林青（李肃如）、缪正元、秦天真三位同志组成，林青任支部书记。这里要

加以补充说明的是毕节党支部的建立，当时还没有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贵州遵义时，党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罗迈（即李维汉），在遵义接见了林青，代表中央承认了贵州地下党组织，党的组织手续进一步完善了。

支部建立后，党对“草原艺术研究社”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演出了几个剧，如《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火的跳舞》、《敌同志》等。“草原社”的活动在毕节山城，宣传了进步的思想，团结了广大的青年，为贵州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我们在建立“草原社”之后，还成立了“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读书会”等组织。我们的活动开展得很顺利，除了有党支部的领导，还有一个原因，贵州全省是地方军阀统治，国民党还未在毕节县成立县党部，只有一个所谓的特派员叫钟华鸣。钟华鸣同秦天真比较熟，我们也有意同他周旋，因而他对我们的活动睁只眼，闭只眼，很少过问。敌人很愚蠢，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草原社”的活动，要教青年唱歌，县政府的一个秘书例行公事，要审查歌单，歌单中有一首歌叫《伏尔加船夫曲》。这首歌在当时是普普通通的，政治色彩不十分浓厚，秘书问道：这是哪个国家的？我们回答是俄国的。秘书就说：俄国的吗？俄国的不许唱。他认为俄国是布尔什维克的故乡，俄国的就不能唱。他又问：“英特纳雄纳尔”（《国际歌》）是哪个国家的？我们回答说是法国的。他说：哦，是法国的吗？可以唱。他认为法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他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里如德国还有个马克思，更不知道有共产主义啦。《马赛曲》也是法国的，当然也就通过啦。

我们还为“草原艺术研究社”谱写了社歌，“草原青年，草

原青年，起来，起来，……”首次演出台上台下一起唱，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真是轰轰烈烈。

除了“草原社”的活动，我们拟建立革命武装。我们听“草原社”邓立忠介绍军阀部队中有个军官叫范建章，对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很反感，不满现状，拉出了几百人的武装。林青听说后很看重这件事，经支部决定，他和秦天真下乡去找范建章，经过详细地考察了解，他们二人介绍范建章入了党，革命武装的事有了点谱谱。

在“草原社”时期，我们还组织过一次声势浩大的罢课运动。林青有个妹妹叫李秀英，十三四岁，因为有人造谣说李秀英作风不好，被县立女子小学校长龚定九开除了。这个打击，李秀英忍受不住，吞鸦片自杀了。为了申张正义，为了向毕节封建恶势力抗争，党支部决定组织罢课运动，向社会说明真相，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支持。由宋达谦执笔，向县政府写状子，控告地方封建势力的代表龚定九，并向外界发快邮代电。这个 是 合 法 斗 争。罢课运动搞起来了，我们还组织抬棺游行示威。李秀英棺木出丧时，林青用一块绿布写了几个大字“为封建压迫而死，死后必做反封建的厉鬼。”挂在棺木上。出丧的队伍经过了毕节县城的几条大街，实际上就成了一次向反动封建势力抗争的游行示威。

后来，我和林青以收集民歌作掩护，到云南镇雄县属的“泼机”找范建章，在泼机一带转了一个来月，没找到范建章。这时毕节城的形势紧张起来，以龚定九为首的封建势力开始反扑了，说我们是“共产党”、“赤匪”、反动当局扬言要采取行动，留在毕节的秦天真见情况紧急，就和一批“草原社”的学生下乡找

我们（天真同志当时认为我们下乡去了那么久，一定找到了范建章），这样一行好几十人从毕节城匆匆出来，走了不到二十里路，后面灯笼火把地追上来了，原来是这些出走学生的家长，闻知“娃娃跑了”就追来了。天真当机立断，动员大部分“草原社”的学生跟父母回去，并反复跟他们说，一经找到李肃如、缪正元后就来接大家，这样好说歹说总算动员了一批人跟他们的父母回去了。留下来一起跟秦天真走的有这几位同志，即：熊开梅（熊蕴竹）、葛发祥、肖世铤。我们在乡下住了一夜，天未亮爬起来不辞而别了。这时回毕节形势不允许，找范建章找不到，我们商量了一阵，为了保存力量，转移到安顺，贵阳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我们分两路走，林青、熊开梅到安顺，秦天真、缪正元、葛发祥到贵阳（肖世铤因有事暂留大定家中）。秦天真亲自送熊开梅和林青到安顺，将熊开梅安置在他的拜把兄弟龙文家里，林青安排在龙腾家里，我和葛发祥在清镇等候天真。将林青安排在安顺，是考虑到当时贵阳情况不明。林青是支部负责人，为了他的安全起见，没有要他到贵阳。

三、战斗在一〇三师

我们根据组织的决定，各自找自己的社会关系，寻找职业作掩护，落脚下来开展革命活动。我到贵阳后，住在忠烈街八号和邱照（徐健生）挤在一间床上。我找了当时王家烈的交通处长——糜君牧帮忙找职业（糜曾在毕节电报局呆过，是我父亲的学生），他答应帮忙。我一边找职业，一边也找我在贵阳认识的一些人。那时钟大亨已从上海回到了贵阳，在港黔公司当经理，做汽车生意，经济上很宽裕，通过他我认识了光懿小学校长尹素

坚，又认识了她的丈夫谷友庄及阮素琴等。以后接触了解多了，我就有意的在谷友庄、尹素坚面前谈到贵州应当进行革命，搞武装斗争……，他们亦是这样主张的，虽然他们还不是党员，但他们思想进步，是党的基本群众。以后我在贵阳的这些关系，在我离开贵阳时，我都介绍给秦天真同志了。

我从谷友庄那儿了解到有一个进步军人叫黄大陆，我将此事同天真一谈，天真立即叫我出面与这个人接触。通过谷友庄，我是在东山观音庙同黄大陆见面的，在座的还有邓止戈。黄在和我的交谈中，提出了贵州应该搞革命，搞革命就应该成立共产党，黄还谈到建立民族武装的问题，我们谈得很融洽。我下山将情况向天真做了汇报，天真当机立断立即写信告诉安顺的林青，叫他火速到贵阳一起联系黄大陆这个武装关系。就在这几天，我家中出了一桩事。我的弟弟缪庆元自杀了。缪庆元是“草原社”的积极分子之一。秦天真带了一群青年男女下乡找我们，缪庆元和他的女朋友糜克仪也跟着一道出来，被父母追回去以后，毕节城里的封建势力造谣生事，谩骂他（她）们，糜克仪被父母软禁起来了。糜克仪写了一封信给我弟弟，但不知怎么搞的，信没有转到我弟弟手里，她久久不见回音，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吞鸦片烟自杀了，我弟弟得知她的死讯，跑到她的灵前，趁人不备用刀割断颈动脉血管也自杀身亡。我得到这个消息心里异常悲痛，虽然我接到家中电报，但没有回去。一则贵阳的工作实在离不开，林青马上就要来了，还得和他一起联系黄大陆这个关系；另外，毕节的客观形势也不允许我回去。这时糜君牧给我找到了职业，在省政府的第三电台当报务员。林青到贵阳了，很赞成我到电台工作。林青说：我们应该有人到国民党的部队中去搞军运工作。